



名人故事

## 水印时堰

□黄融

烟雨初霁,东台时堰的河道泛着幽幽微光。水,是这片土地的血脉。五千多年前,良渚先民择水而居,早已深谙其脾性——它既能滋养稻谷,也能吞噬田园。水网如细密丝线,缠绕着陶庄、塘坝、雍庄等古村落,将它们缝缀成一幅浩瀚的锦绣画卷。从空中俯瞰,塘坝村四面环水,恰似凤凰展翅欲飞,羽翼上抖落的尽是粼粼波光。

水孕育了时堰,也考验着时堰。里下河地区地势低洼,积涝成灾曾如高悬在乡民头顶的利剑。洪水漫溢之处,瘟疫随污水蔓延,水从生命之源化作无常的诅咒。就在这时,冯道立出现了。这位清代水利学家踏遍江河海滨,著书四十余部,始终心系故乡的沟渠。他倡建的古井深藏于井栏巷深处,井栏由麻石制成,内径仅容一桶,却神奇地维持着微妙平衡:枯水期井水不竭,洪水期井水虽高出路面,却不会溢出,乡人敬畏地称其为“神井”。至此,水被驯服,成为温顺的守护者。

水的两面性在时堰的肌理上刻下更深印记。道光年间,除了水患,又添新忧。时堰因盛产蒲草,家家户户编织的蒲包堆积如岭,“蒲岭连云”名噪一时。然而,蒲草干燥易燃,火灾频发,乡人一年的心血常化为青烟灰烬。道光十六年,冯道立考察途中见到大城市的水龙消防器具,眼前一亮。归乡后,他不仅慷慨捐出两千大洋,还四处奔走劝募蒲包商贾,最终购回多架木桶锡制水龙,并配套铁制球灯、高柄水笼、水桶扁担等物,创建了“务本堂水龙会所”,后为水龙局。

这水龙局并非一时应急之策,冯道立深谋远虑,在太平桥南购地建起八间瓦房仓库储放蒲包,更购置公田百余亩,以田租维系水龙局百年运转。从道光年间直至民国,那架斑驳的木质压水器械始终守护着烟火人间。百姓歌谣至今仍在水汽中回荡:“水龙局,防火烛,水火平安都享福,蒲堆草房不用愁,再不听见有人哭。”水与火在此达成奇妙共生,冯道立以水利专家的睿智,在水的柔性与火的烈性间架起坚实桥梁。

水的记忆沉淀在时堰的砖石草木间。双溪村口,一株古银杏巍然矗立,底部围长近三米,六百圈年轮里藏着张士诚旧将的遗恨。据说当年日军欲锯树筑堡,锯齿切入处竟渗出猩红浆液,士兵惊惧而退,“神树”得以幸存。这树根深扎水岸,以血色汁液昭示着生命对暴力的抵抗。陶庄古石桥的麻石条板被时光打磨得温润如玉,桥身“兴旺桥”三字虽已漫漶难辨,却依然承载着乡人往来的脚步,清嘉庆年间的工匠智慧在潺潺流水中愈发坚固。

今人行走时堰,水韵依旧流淌。文化站征集整理的插秧号子、车水号子、河蚌舞、龙舞等非遗项目,在一年一度的“时堰庙会暨群众文化艺术周”中焕发新机。当龙舞队伍掠过青石板街,鼓点与脚步震荡着水流,百年记忆被重新唤醒。这些带着水汽的声响与姿态,是水乡灵魂最鲜活的搏动。

古镇的河流穿行于现代光影之间,也悄然带来一丝忧虑。当长三角诸多古镇陷入“千镇一面”的困境,当青砖红灯笼沦为千篇一律的装饰,时堰却因水而保存着独特的呼吸节奏。专家早已警示:古镇的生机在于留住“孩子有学上、父母有工作、爷奶奶奶有人养”的生活脉动,而非打造人去楼空的标本。所幸时堰人深谙此道,陶庄村千余户人家中,仍有1000多人常住于祖辈相传的屋檐下。古镇老茶馆里氤氲的水汽与谈笑声,水岸边浣衣淘米的日常图景,漫成了最绵长的时光。

黄昏时分,泰东河水载着碎金流向远方。务本堂水龙会所的铜铃早已静默,冯道立种植的树却愈发葱茏。时堰的流水不争,只将几千年的悲欢化入深巷苔痕——古井水仍映着七仙女汲水的传说,塘坝的凤凰形水网在暮色中收拢羽翼,而双溪那棵流血的老银杏,伤口早已愈合成坚硬的图腾。这水乡的魂不在游客相机的闪光灯里,而在居民打水时桶绳勒出的掌纹中,在代代相传的治水智慧间。水流过处,时间成为有形的印痕,提醒我们真正的守护,便是让活水永远活在此刻的脉动里。

文明史话

## 制瓷术的发明与外传

□冯君豪

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初期,陶器就在中国大地上制造出来了。中国先民凭借超人之智,进而改善制陶术,日后出现了比陶器更好的用具——瓷器。

延及东汉,积千余年成败的经验教训,制瓷术飞速前进,瓷窑产品已大体与现在产出的瓷器相似了。由魏晋南北朝而入隋,中国窑场内烧出了白瓷茶碗。唐代的制瓷业跨步迈前,全国二十余窑场的饮誉者有定窑、邢窑、邛窑、越窑、昌南窑、潮州窑,而以越邢两窑号唐代两雄。越窑在今浙江余姚市上林湖一带,余姚古属越州。越州窑工把青中夹黄的釉料改进成苍翠的丛山般的颜彩,晚唐诗人陆龟蒙说它是“夺得千峰翠色来”,可知其着色之美。器上画有花鸟、人物、几何图案。邢窑的所在地,古属邢州。所产瓷器,胎质细洁,釉色白润,如银似雪,丰富的产量,全国各阶层的白釉可用到。越窑的青釉与邢窑的白釉制作非易。烧青釉至一定火候要严密调节其温度和通风量,好让燃料生成的少许一氧化碳将釉中微量的铁还原为氧化亚铁,由此而获青釉。制白釉则须选择纯净的原料和细致周密的加工。这些技术,唐代窑工都很熟练,真正体现了唐代青白两瓷的高超水准。

宋代的瓷业是中国制瓷的黄金时代,那精良的选料、工整的造型、艳丽的釉彩、优美的图案、高雅的格调,很是养眼。国内窑场之著者,北方有定窑、钧窑,南方有龙泉窑。定窑在今河北曲阳之涧磁村与燕山村,古属定州。窑产乳白色瓷,人谓“定州花瓷瓿,颜色天下白”。所烧绿、酱、黑诸瓷也是驰誉当时的。器皿上有贴花、印花、刻花。窑工创成的覆烧术,使产量猛增。

元代瓷器重蓝釉花纹、红釉花纹和朱砂釉等色,主产地系景德镇。由明迄清,景德镇窑场已成全国瓷业中心,有瓷都之誉。此地出产各种釉色和彩瓷。其余瓷窑,遍及国内。明世宗嘉靖、神宗万历时的红釉瓷与蓝釉瓷,也出自该地。清世宗雍正、高宗乾隆时的“古月轩”瓷,学者评为古今独一无二的神品。景德镇瓷业之盛,全国少见。

中国的瓷器与制瓷术在唐宋两朝已传入朝鲜与日本。日本制瓷晚于朝鲜,迟于中国千年。“奈良三彩”系其上釉陶器的滥觞。从奈良到平安,日本窑场没有烧出够格的产品,专靠从中国进口。后醍醐天皇安贞元年加藤四郎自宋归来在尾张的濑户,率先烧制宋式陶器。其成品为茶褐的底色上用黄釉涂以花斑。后五郎太夫祥瑞自明归来,在有田烧制的陶器,釉白而闪光,几何形花纹,十分精致。正亲町天皇天正年间长次郎

烧制的“乐陶瓷”,端庄而含温暖的色调。此时日本的陶瓷业已兴办但未发达。

东南亚的瓷器,唐代有大宗输入,人们在新加坡的柔佛海峡附近捡到许多唐青瓷碎片。已故的中国学者韩槐准在文莱买到过唐式的黑、青釉两耳樽各一。雅加达博物院收存的青水壶也是唐代制品。马来半岛彭亨的瓜拉立卑金矿场出土的四耳青瓷樽非唐产莫属。宋代的外贸商以陶瓷跟占城(今越南中南部)、真腊(今柬埔寨)、阇婆(今印尼爪哇岛中部)、渤泥(今文莱)换回当地的土特产。他们输入该国的瓷器有杯、钵、碟、碗、盆、瓮等,下延至元明清,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照常贸易。如今,中国的古陶瓷在菲律宾屡被挖出。它有力地证明了古代中国和东南亚诸国贸易的兴盛。

华瓷出口西方,陆上沿丝绸之路自西安而达波斯,海上越波斯湾而达非洲。考古学家在印度、伊朗、埃及、摩洛哥、埃塞俄比亚掘出若干唐宋元明的残瓷。埃及先民很早就学会制陶,直到十一世纪,一名赛尔德者学习了华瓷的制法而造出了宋式瓷器。

欧洲载籍首先提到中国瓷器的,当推供职元朝的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·波罗的《东方见闻录》。华瓷于中世纪辗转输入欧,能享用的只有贵族阶层。中欧流传一个故事,说萨克森(今德国东部)国王艳羨其邻国君主所得的几个华产插花瓷瓶,百计思得之,未几沟通关节,他用四队近卫军换回十二只花瓶。这十二只群呼的“近卫花瓶”现仍收藏在德累斯顿博物馆内,供人参观。英国主教瓦舍于1502至1532年留给牛津大学新学院的“瓦舍杯”,底印明孝宗宏治年号。这只青瓷杯被安置在一银座上,现仍由该学院保管。

中国的制瓷业素来居世界之首,至清末衰落了。最近的四十余年来,制瓷业大步赶了上去,又恢复了青春,走在世界的前列。欧洲人于分布世界多处的华瓷癖好不衰,饶有兴趣地开展华瓷的学术研究,写就论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,申说自己的见解。前人朱琰的《陶说》、蓝浦的《景德镇陶录》、项子京的《瓷器图说》皆已译成英语。这表明华瓷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多么重要,值得珍视!

